

書評論壇
評論

對「地方」的歷史存有論進行人類學探問

鄭瑋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宣衛（2022）的《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一書，以人類學視野與田野工作的敏銳度，結合地理、歷史、人類學與社會學等的研究成果，勾勒出池上做為地方的意義及其屬性，在歷經清領、日治、威權體制、民主化到新自由主義化的歷史過程中，因應世界局勢而來的國家治理特性，藉由一連串的經濟制度、空間治理和國家－地方關係之作用，造就出今日以良質米與稻景為核心意象的地方產業和榮景。特別是，該書打破了人類學界以原、漢之別或村為研究單位的研究慣性，觸及了社會經濟、公民社會、國家治理、社造與地方創生、東台灣及其歷史形構、空間研究及聚落研究等主題，成就了一本關於東台灣地方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民族誌。無疑地，這本書是近現代台灣歷史發展的縮影，它娓娓訴說在一個以移民為主的地方社會，人們如何透過各種努力與合作，造就了跨人群、跨地域的社會／群性（sociality），並在調和衝突與矛盾的過程中，一起生活。

首先，該書指出「鄉」這個行政單位，是如何在不同時代的國家治理特性下的歷史地理座標和政經制度安排，交織出池上的空間與社會紋理。有別於社造以「物」為中心的施作方式，作者指出，池上這個地方社會的打造，乃是以「人」的凝聚為核心，對新觀念的接受、情懷以及共善共好的價值，共同推動了實踐；同時，鄉公所介入、導引並創新社會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緩和了地方產業與文化觀光帶來的社會不平等。這樣一個立基於社會歷史、共享價值與人們投注心力而形成的地方社會，體現邁向真實烏托邦的潛力，凸顯以人們關注之事物去形塑地方性的種種實作，展演出「在地」「第三條路」的序曲。

其次，對於台灣史、人類學、社會學與區域研究等領域的研究者而言，該書豐富的資料與在地觀察，足以引起許多有意義的討論，例如，（對比於

西方市民社會發展，) 台灣公民社會的特性、地方社會與社造的關係、東台灣面臨的國家治理特性及其後果，乃至於超越「族群」劃界的「地方性」等課題。

以下，筆者僅就個人研究與理論興趣，提出三個可以繼續思考或詮釋的方向。

第一，作者對於「地方」做為研究單位的存在基礎及其性質，援引John Agnew將地方視為有意義的區位，包含了區位、場所與地方感，並依循人文地理學者Tim Cresswell將「地方」視為一種認識論與方法論的主張，認為其呼應人類學研究看重人們對空間的認同與情感層面，進而能擺脫過去區域研究的限制（p. 114）。筆者認為，這本書透過文獻、圖資與經驗材料的分析，呈現出歷史、政治、經濟與宗教面向如何結合或保持分離，塑造出地方在治理體制下的存有動態，而非只是一個有待認識的對象。這凸顯出人類學家在研究地方時，援引地理學對概念內涵的區辨時，仍能展現其特殊學術關懷，特別是作者於書末指陳，在其分析架構中，「個人才是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環節。儘管不同地方的人都受到結構性力量（如環境、人群互動、國家及市場）的限制與影響，但人都會為了生存及追求美滿人生而努力，並以各種創造性的想法，構作出（making）混合著矛盾、衝突以及可能與希望的生活世界」（p. 295）。

更重要地，這本書以民族誌試圖呈現出池上成為「地方社會」的歷史存有論（historical ontology）。清帝國藉清查土地、賦稅與駐軍以防止邊疆社會（frontier society）動亂；日本殖民政府以稻作「馴化」居民及其心態，而三層空間架構與相應措施，將地方及組織制度得以安置在治安國家（police state）的統治視域之內；黨國時期的政治經濟現代化，造就新的行政與市場中心出現，並伴隨著多族群、跨地域的宗教生活樣態；在新自由主義化過程中，地方既是實驗公、私夥伴關係的場域與對象，更是人們實現或創新生活方式的希望之地。換言之，歷史上統治與措施的細緻化，將池上形塑成行政疆域的一個區塊與人類活動匯聚之處；同時，物理空間上的分化治理的技術、經濟社會生活和宗教活動，呈現出地方的歷史存有是由異質關係性所構成。

第二，作者討論到鄉公所策劃、執行的「社會再分配究竟是否為對資本主義的抵抗」時，除了顯示其對於地方社會如何在資本主義過程中，找尋另類出路的關懷，更觸及其如何看待「政治」之存有與權力體制的問題。作者指出，由鄉公所主導的再分配制度具有抵抗新自由主義或資本主義（pp. 259-262）之意涵，展現了社會經濟的意涵。事實上，此一解釋是從國家治理的制度性、資本主義與集體實踐等三者間相互作用這個角度，做為出發點。作者從政治制度推行來勾勒國家治理，偏重於統治（administration）與措施（measures），被統治者則與行政權力對峙，並回應、服從或抵抗種種措施。由此觀之，結構與能動、國家與社會這類二分，是作者在理解當代地方社會中人們行動之政治性的架構。

因此，在探問我們還能怎樣去挑戰當代資本主義這個問題時，作者聚焦於集體行動如何展現民間動能，以凝聚共識形塑的在地性，去改造行政體系或政府部門（如「政府社造化」）這些充滿希望的可能選項，而另類出路及其實作就是從共同利益與價值、關係、合作與共識中，浮現出來。

讓筆者提出另一個解釋材料的視角。從Foucault（2007：196-197, 201-203）的角度來看，從事稻米生產者、鄉公所與主要行動者，可視為新自由主義治理性所生產的自負其責之企業家主體，米的品質控管與評鑑就是有效的管理機制，人們的行動受到治理性之引導而成的舉止（conducts），而社會再分配就是利用這些治理性之中的元素，去進行違逆治理性的反舉止（counter-conducts），此二者同時存在於治理性的視域（horizon）之內，且彼此不可分，是透過重複執行反舉止，來對制度或體系進行改動（alteration）。也就是說，對治理技術或資本主義邏輯的「反動」，是來自位於權力體制的主體之倫理抉擇。當然，Foucault式解讀可以呈現出另一個層次的「地方」歷史存有論，但不一定能更好地呈現作者對於「地方」具有「做為結構內的能動者」這類潛能之關懷。

藉上述對比，筆者想指出，對於當代政經現象的詮釋路徑與解釋視角，必然與研究者對於對象的社會實在與行動者／主體的認識論有關。一方面，這本書自始至終忠實於作者對政治經濟治理的認識、對集體行動與制度的作用關係與詮釋，以及對研究之用與知識之用，現象、理論、概念、分析與

理念立場，彼此一致，展現了作者在研究上對於何謂至關重大（what really matters）的堅定立場。另一方面，當鄉公所在管理稻米生產、認證與再分配過程中展現合（或超）乎期待的效率與實績時，研究者該如何去定性這種納入某些新自由主義主張、有效執行並帶來正面後果的國家權力之性質？甚至，在作者筆下（但可能並非有意為之），鄉公所甚至於國家權力的展現比較不像擁有清楚邊界的實體，更近似以帶有朦朧不定的周邊在社會場域中運作——這或許是基於細膩的田野工作才可能掌握與呈現的國家與權力之面貌。無論如何，若不願將這些面向粗略地歸因為新自由主義治理性的效應，我們就必須對於當代國家權力體制內的運作形式、樣態與後果，提供更細緻的民族誌，做為重新概念化的基礎。

第三，至於本書在人類學研究當代地方社會的定位與獨特貢獻，作者指出兩個面向。首先，對比於黃應貴在《21世紀的地方社會》（2016）一書的導論，提出以個人與社會想像來勾勒新自由主義化之下的地方社會性質這個立論，作者則以池上為例去證明研究者可透過「地方」在歷史空間與治理體制的轉變過程，來達成「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這個層次。其次，本書的獨特貢獻在於「以一個鄉為研究單位，並發現這個鄉發展出一個以『鄉』為社會再分配的制度……透過地方政府在公共性上的堅持，發展出再分配的政治施為，試圖緩和新自由主義對地方帶來的衝擊，且短期內這樣的體制仍居於支配性」（pp. 276-277）。這是從方法論與資本主義體制之內是否有另類出路的視角所做出的定位。

筆者認為，《成為池上》的民族誌材料提供我們許多思考地方社會性質的啟發。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定居池上多年的移民後代形成了紮根於土地的生活方式：歷經從日治三級空間，轉變為市場與行政中心的空間轉移，在節慶時跨地域、跨人群的宗教連結、共食與共同遵守習俗所形構的宗教社群性，以及在平日則因著以稻米為中心所進行的生產、管理、消費與再分配而形成經濟社群性。伴隨著新自由主義化過程，以稻米為核心的產業性質及其經濟社群性的轉變，牽動的是人們如何以未來這種時間性為出發點，從想像當下的經濟活動中，去醞釀尚未出現（not yet）的生活方式之潛能，從而願意將對於更好的生活方式，交託給以地方發展為名的集體活動。

特別是，稻米做為池上這個地方的重要意象，不只涉及了當地人藉此將地方美學化，該意象更蘊含了一個在地方空間內由生產、消費、家庭、社區與宗教活動等共同構成的「地方」生活方式之整體。再者，做為行動者所關注之事物，稻米產業是一種能同時實現「公」／共好共善與「私」／更好的生活方式這種關係性的經濟實踐。換言之，居民或行動者做為多層次（家庭、社群及未來）的關係自我（relational self），是透過與地方的關係而能夠被人所想像、實現與預期。

若前述詮釋成立，那麼本書所勾勒的「地方」與人之間的關係面貌，將明顯有別於黃應貴以個人對空間的部分特徵或空間中活動所產生的認同關係（identification）所建立之論點：一方面，他從不同個人依照對未來的想像而去擷取生活空間中的部分特徵，各自呈現出他們與地方之間獨具特色（idiosyncratic）的關係樣態；另一方面，人們藉著共同活動維護環境以確立地方做為共同生活空間的意涵。相較之下，在池上，我們可以看到人、地方（空間意涵）與生活方式三者之間有著彼此連動、相互指涉的關係，凸顯出本書為何以地理空間中人群活動來定義地方，並透過人的凝聚來創造屬於地方特有的新生活方式，而在風景或地景上的集體活動，一方面將地方美學化，另一方面讓新的生活方式紮根於地方。

如果人的凝聚是形成池上這個地方社會的關鍵，筆者更感興趣的是作者在本書中所呈現的人之面貌。在書的前半，作者以宛若特寫方式去展現地方仕紳或商號、組織或機構中具名行動者及其生命史軸線，符合一般讀者的閱讀習性。有趣的是，正如作者提示，以移居者為主所形成的池上這個地方並沒有強大的宗族，各類領導頭人更像是在社會生活過程中所造就的，這一點可從生命史中一窺他們參與地方事務或成為頭人的社會條件和網絡。此種從結構與能動區分下來掌握行動者之面貌，呼應了作者一貫的立場。然而，在當代生活環境的巨大背景之下，我們看到作者藉由勾繪行動與實踐，呈現出一幅關於居民整體印象之人的面貌，意即，被行動與實踐所體現的「人」之集體面貌及其共同意識或意圖。我們並不清楚，書中呈現上述兩種對於人的存在之不同認識，是出自怎樣的現實關懷或知識論立場，或者，作者是如何在田野工作中，去捕捉與呈現在地方中那一個又一個努力生活著的人們與日

常活動的痕跡與風景？這或許是我們未來在處理人與地方性如何深切交織的議題上，可以繼續著墨之處。

參考書目

黃宣衛

2022 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台北：左岸出版社。

黃應貴

2016 導論：21世紀的地方社會。刊於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群性與社會想像，黃應貴、陳文德主編，頁1-46。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Foucault, Michel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Michel Senellart, ed. Graham Bruchell, tra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